

跨越“卡夫丁峡谷”后怎么办?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李 诚

内容摘要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不仅在经济上面临“跨越”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在文化建设上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初级阶段”的文化与先进的社会制度并存,决定了这一阶段文化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种情况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建立有效的反馈反应机制,采取灵活而不失原则性的对策,实行强有力的主流思想教育,在文化上保证“跨越”的成功。

关键词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卡夫丁峡谷 初级阶段文化 文化建设 对策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专辟一节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其中说: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这些话把我们所面临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任务的重要意义与紧迫性,强调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里,江泽民所说的“一贯倡导”,当然自有其根据。“精神文明”这一命题,始自邓小平1979年10月给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他说:

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

嗣后他又不止一次特别提到这一问题,如1980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阐明了精神文明的内涵^[2];1982年7月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又明确论及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党的十二大报告亦提出:

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3]

因此后来更进一步,在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则、任务等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规划。

10年之后,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又一个决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由于这个决议是在党已将邓小平理论郑重地写到自己旗帜上以后作出的,而且它比较系统地集中和概括了邓小平关于建设精神文明的思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无疑也应当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

从上述这个简单的回顾不难看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论述,正表明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何以见得是一种“深化”和“发展”呢?十五大报告勾勒了党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行动纲领,融入了邓小平理论的有关内容,以经济、政治、文化鼎足而三的方式,更加强调和凸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其经济、政治的有机联系与重要性,从而使我们在稳步、健康、持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同时,必须更进一步认识到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和紧迫的意义,进一步认识到这个任务的尖锐性和复杂性。

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深刻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4]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岂能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岂能不“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与政治?

故我们不能不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诸问题略加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 理论与背景

如前所引,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不能不首先把握和考虑其经济基础。

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了以农村生活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可以以土地公有制为起点,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5]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6]。后来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都先后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成功地将他的大胆设想变为了辉煌的现实。

但是“跨越”之后,人们将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将向何处去,却是马克思当时不能也不可

能回答的问题。

可以认为,俄国和中国都对“跨越”之后这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进行了时而不自觉时而自觉、有时甚至是极其艰辛的探索。众所周知,此时此刻,俄国已退回此岸,重新开始跋涉“卡夫丁峡谷”的艰难历程,其彼岸究竟何处,恐怕是一个只能由历史来回答的问题了。而与其相较,中国虽已站在彼岸,然而光辉的巅峰尚远,四周惊涛拍岸。立足之处,沙滑石走,时有崩岸之虞;前驱之径,兽伏草长,难免性命之忧。经历了整整20年的欣悦与痛苦,最终在邓小平主持下,全党终于认识到,“跨越”之后,站稳脚跟,守牢阵地最重要,披荆斩棘,逐步前进最关键;终于认识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因此,党的十五大郑重地提出:我国将在基本的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经济体制方面,“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毋庸置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也只能是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的“反映”。换句话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在这里,“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同样重要,应该统一起来加以认识。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是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处于农业国、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这样一些国情所制订的,那么与之相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的制订也应是由此出发的。

明乎此,我们在贯彻实施这一文化纲领时心中就应牢牢记住上述国情,就不会在由极其复杂的国情所导致的千差万别、五光十色的文化现象面前为之眩目而不知所以,就会清醒地按照邓小平的教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科学地分析情况,有效地提出对策。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客观具体地去分析情况,将党的十五大所规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纲领看成一个目标、一项原则,而用我们的工作去将其具体实施;不是将这个纲领作为僵死的教条和框子到处生搬硬套,而是将其视为指南,在其指导下,创造出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纲领实施的生动活泼、绚丽多姿的一种文化生活局面。

这里,我们不能不想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到“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时说过的几段极为精彩的话。他说: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该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

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国民文化。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习、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7]

显而易见,在当时的中国,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既非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混合有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文化,其思想和基本范畴当然是资产阶级的。

任何简单的比附都注定是拙劣的。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阶段当然不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文化当然也不再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因此,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不再仅仅是一种领导思想,而是全社会的主流思想。但是正如我们前述分析中所已指出的,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国情极其复杂的阶段。因此,毛泽东观察分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法启迪我们意识到,面对中国现阶段多元的文化现象,我们也应多元地加以应对和分析。

二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现状

要就这一题目作详尽分析论述,非本文所能完成,因此只能就其荦荦大者,对一些表层的文化现象作一鸟瞰式的观察。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三种基本的文化思潮。概略以言之,即西方文化思潮、中国传统文化思潮、共产主义思想。请次第简析之。

1. 西方文化思潮

中国自明中后期,即有西方文化思潮随着教会人士而袭入,但对中国整个社会尚不足构成冲击。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西洋的坚船利炮使巍巍中华帝国如泥塑金身匍然仆伏于碧眼金发的“西番”脚下,中国人方如梦初醒,乃知有如是之西洋,有如是之西方文化,是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第一次撞击。“五四”运动为反对卖国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而起,莘莘学子慨然振臂踊跃于运动前列,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与帝国主义列强第一次直面抗争。以此为契机,刺激了后来二三十年大批学人负笈西游,又将西方文化舶来中国,与中国新兴的或买办的资产阶级互为表里,共存共荣,是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第二次撞击。改革开放,国门敞开。久已为“东风”所压制的“西风”愈演愈烈,“外国的月亮也要圆一些”乃成某些国人一时之口头禅。来来往往,争名于西,熙熙攘攘,获利于东,一时间好不热闹!是为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第三次撞击。

回顾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三次撞击,无论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不能不接受一个基本结论:目前西方比我们发达富裕。由此,在我们现阶段社会中,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乃有四种表现。

其一,欲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服膺其科技,否定其价值取向。

其二,仍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服膺其科技,亦不简单弃取其价值观,对其科技、文化皆努力吸取其长而为我所用。

其三,全盘接受,五体投地以膜拜之。

其四,信仰其某些特殊表现形式,如基督教、天主教。

上述四方面情形,就大体而言,第一、二种以职业论多存在于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中,以年龄论约在45岁以上人群中。第三种则分布较为复杂,但在高校从事自然科学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者中较为集中,以年龄论约在30—45岁者为多。第四种则广泛分布于工厂、农村中。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不少工厂、农村都有一些自发的基督教、天主教活动小组且呈逐步蔓延之势。他们利用节假日集中,以小组形式讨论教义,映证道行,而并不去城市中的教堂。据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普通农民加入其中。

2.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若以两千余年来走势观之,要不出释、道、儒三者。

其一,佛释的表现主要还是以宗教迷信的方式广泛存在于各阶层人民中,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干部顶礼膜拜于庙宇者亦不在个别。庙宇香火之盛,超乎既往数十年。

其二,道的表现仍以宗教迷信方式为主而广泛存在于民间,只是道教重现世而不计来生,故服膺者远不如释。不过值得注意者,道家清静无为、超脱世外的出世思想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潜移默化、自觉不自觉的影响。

此外应特别指出的是释、道二者从伦理、哲学、文化艺术的角度观之,自然别是一番学术境界。但不从事相关专业,没有精深的知识,难以窥其堂奥,故其哲学思想对整个大众文化的影响尚小。

其三,儒的思想表现呈现极复杂状态。儒家思想本博大深湛,更加历代统治者奉为正宗,以之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和工具,不断加以改造、充实(此“充实”为中性词),故更是根深叶茂。它本来植根于中国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小农经济,有浓厚封建色彩,但又由于历代思想家的发明阐扬而集中了中华民族伦理、哲学思考的精髓,因而可谓精华与糟粕杂而有之。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中受其影响者主要表现为一则主张对其灌注以新的诠释,对其思想体系加以重塑,寻求其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新的契合点,以之为中华民族立国立民之本,近年来风行于新、马、台的新儒学即属此类。一则各取所需,接受其消极一面思想影响,如封建等级观念、宗法家族观念等等,不一而足。如若说前者多见于知识分子中,则后者多见于政府部门与广大农村乡镇及中小城市市民中,拥有广大自觉不自觉的奉行着。

3. 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思想本来亦是舶来品。但是在近百年的反复曲折中,它与中国的现实和革命实践相冲突激荡,相折冲结合,结果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两大理论结晶,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已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寻找到了自己最惬意的家园。

共产主义思想所描绘的人类社会未来的蓝图固然是美好的,而它所昭示的途径从宏观的人类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也是可行的,因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它绝不是一种停留在纸上和口头上的空谈,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尤其是我国自改革开放20年来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更让人感到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客观而言,共产主义思想在今天的中国具体表现形式就是邓小平理论。我们如果以信仰这样一种理论并愿意为之毕生奋斗作为标准,而不以是否参加共产党组织作为标准来衡量,在今天的中国,信仰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数在经历“文革”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挫折后,正逐渐呈上升之势。这些人中当然有相当部分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各级领导者,但更令人欣慰和怦然心动的是在普通的知识分子、农民、士兵中,这样的人正越来越多。近年来高校学生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人数稳步上升,提出入党申请乃成为正大光明、值得称贺的事情即为明证。

以上我们简略地从一般文化学而非政治学的角度列举了中国现阶段所客观存在而最具影响的几种文化思潮。我们的目的,当然并不在于去一一指出其是非或合理与否——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一角度来说,这里恐怕正好可借用老黑格尔的命题:“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虽然“合理”并不等同于合法、正确——而在于说明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们不过是现实的反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可以尽量清楚、尽量正确地认识它,却不可能凭空地去消灭它或培养它。我们通常所说“消灭”或“培养”某种思想,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思想的根本“消灭”或“培养”,只能取决于它们赖以生长的土壤——“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共产主义思想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固,乃是由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所决定。推而言之,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正是经济上敞开国门的必然结果。或问,同样是西方文化涌入,何以有前文所论西方文化影响的四种不同表现呢?何以又没有都“全盘接受、五体投地”呢?其实这也并不奇怪,不同的表现仍然决定于四种文化形态所依赖的不同经济基础。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中,即有“合资”、“独资”。它来“独资”,必然带来全套“独资”管理,必然在其范围内奉行“独资”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取向,必然会要求与其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相适应的氛围和服务,只要有这样的土壤存在,“全盘接受、五体投地”们就得以最终存在。也许你可以限制它,却实在无法消灭它,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事实吗?

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许多文化现象实际上不仅不能“消灭”之,甚至也不能笼而统之地“限制”之。因为它们不但存在“合理”,还可以一时合理地存在。试略举几例以析之。

西方文化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提倡“平等、自由、博爱”。如若从共产主义思想角度观之,所谓“平等、自由、博爱”,当然已是一种陈旧、落伍的思想。但是我们却不能忘记,当这种思想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萌生之时,所冲击对象,乃是黑暗的封建主义呢。由于我们在社会制度上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至今,在我国部分经济落后的小城镇、乡村,仍然是封建势力和意识的天下。在这些地方,名为共产党掌权,实际上封建宗法横行,买卖婚姻、妇女买卖、族长家长特权等正严重地桎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8]。

列宁曾经从《俄国识字状况》一书中抄录了1897年俄国居民识字的情况并列表发表评论说:

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实际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就是

我国资产阶级文化的情形也是很糟的。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距离普遍识字还远得很,甚至和沙俄时代(1897年)比,我们的进步也太慢。这是对那些一直在“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想入非非的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和责难。这说明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巨大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已经赢得的胜利的基础上真正达到某种文化水平。^[9]

他不止一次地表述过类似的思想,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中他又说:

我们对那些过分唠叨,过分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好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10]

他甚至把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相连,这样来表达他的思想: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我们的政策把城市工人真正培养成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

我说了“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要赶忙声明一下,以免引起误会或过于机械的了解。决不能把这一句话了解为似乎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还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危险的。^[11]

列宁说的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我们上述所指的那一部分落后地区的状况。在这些地方,文化建设甚至应当是从“人、手、口、刀、羊”开始的。因此在这些地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较之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文化状态显得更为鲜活、进步,且相当具有冲击封建势力、封建观念的力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公小私”,“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之类的教育或具有更实际的意义。改革开放20年来,从中国广大偏僻的乡村和小城市走出了大批男女青年,他们涌入大城市,涌入沿海特区;然后带回了钱,更重要的是带回了个人通过勤劳和智慧发财致富的理想以及随之相伴的一整套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不言而喻未见得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甚至还带有相当明显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色彩,但是这些理想和价值观藐视当地的封建权贵,提倡妇女走出家门与男人共同奋斗,从而解放了妇女,冲刷了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他们无疑就是中国今日的“当代英雄”。这难道不已经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从解放生产力、彻底根除封建势力和意识而言,这种冲击将最有效,而代价最小。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应该是支持,还是指手划脚地批评呢?如果支持的话,又应该怎样加以积极的规范、引导、教育以至循序渐进引入主流思想的轨道呢?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悄然兴起,是又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从观念上来看,它们与共产主义思想绝对是格格不入的,是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不能接受的。但它们却在人民群众中活泼泼地存在。从“利”的方面考虑,它的教义、观念极大地抚平了一部分尚处在温饱线下的农民和下岗职工暂时受到挫折的心理,维持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平衡。不能不说这在客观上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但是,它们却又是一柄双刃剑,利弊兼备。因此从“弊”的角度考虑,我们时时都不能忘记基督教与天主教有极强的凝聚力。当它们一旦形成一种社会

力量,那它将在社会和国家的天平上成为一枚极有份量的法码。苏联、东欧的巨变,教会在其中即起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那么孰利孰弊,何去何从,何取何弃,恐怕不能简单地以“限制”、“消灭”而论之了。这又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庞杂,那么其中哪些是精华,哪些又是糟粕,哪些可以帮助我们的文化建设,哪些又将成为我们进步的羁绊?

儒家讲“人治”,看起来似乎与我们今天提倡“法治”相悖,乃属落后之论。但是且慢!“人治”的思想运用于政府建设,其实也就是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重“吏治”的思想,应用于我们今天,也就是搞好公务员队伍建设的思想。再好的法律,也是高素质的人制订出来的;再好的司法,也是高素质的人去操作实践的。这些年来,中央有不少好的政策,但往往到了下面,就碰上了专念歪经的歪嘴和尚,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不正是“吏治”也就是“人治”不善的失败吗?目前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的整改正进入关键阶段,国企所面临的困难已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个中原因固然多多,一言难尽,但是班子成员的优劣,却是极其关键的一环。这不又该是“人治”大显身手之时,英雄有用武之地吗?

法家讲“法治”,但是现代法治思想中极重要的一点却讲究对犯法者人权的保护,因此请律师、免死刑、讲仁慈等等应运而生,不一而足。显而易见与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且慢!回顾既往人类史,但凡社会大变革大转化之日,即不免沉渣泛滥、社会动荡之时。服务于人类社会、维护大多数人利益恐怕乃法律之第一要义,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义。有道是,“乱世用重典”。现在虽说不上是“乱世”,但是在部分地区、个别行业,从干部到细民,从个人到法人,罪案居高不下,偷窃国家蔚然成风;而更紧要者,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观望逡巡者即得鼓励,社会风气势将日益沦丧,危及国家根本。法律就是社会的教师,法家倡导以吏为师,有深意焉。故今之法治,当随社会需要而突出严刑峻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现有的法制框架内,在依法治国的轨道上,从重、从严、从快惩处罪犯,令心怀侥幸者敛手,使图谋不轨者却步,法家思想颇有教益,未可偏废。

以上“人治”、“法治”看似对立,其实正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情。当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跨越“卡夫丁峡谷”之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还保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惯性向前缓缓滑行,整个社会极其落后的文化状态也决不会突然改变。在一个封建意识尚极其浓厚、文化水平尚极其低下的国度,好的“人治”与严厉甚至过分严厉的“法治”都同样需要^[12],因此反映这种现实的文化与思想理当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一席之地。到底该不该嗤笑“清官”意识?又到底该不该轻消严刑峻法?这仍然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由上观之,在中国现阶段,或说得准确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的阶段,是一个多种思潮交锋争雄的阶段,如果时时想到一定的文化“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名言,那么这又是一个我们所有党的理论工作者时时应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勤勤恳恳、龟勉从事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说这是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其深刻含意正在于此啊!我们岂能不深长思之,认真探索建设之道呢?

三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对策

那么如上所述,岂非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用不着有什么一定之规了?就谈不上什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纲领了?

不!现在且让我们来重新咀嚼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阐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应当更能感到这个纲领其实正是在洞悉我们上述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极其凝练的语言,既提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提出了目标和中心(培育“四有”公民),还提出了建构的内容(民族、科学、大众文化),是相当深刻全面的。那么具体应该怎样着手呢?我们有这样一些考虑。

首先,抓主流思想。所谓主流思想,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主流思想反映着我们经济基础的基本状况,昭示着国家和人类美好的未来,既是美好的理想,又是活跃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因此首先应该抓住它。抓主流思想,一是宣传,二是教育,特别是教育,即对于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党员、要求入党的同志的教育。邓小平对此有极其深刻的论述。一方面,他提出: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13]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强调:

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14]

这些出自一位亲身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全过程,又亲手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新航程的世纪伟人的肺腑之言,当值得我们如何深长思之、念兹践之呢!

但是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却注意到,往往中央和国家一级的教育很有质量,而越往下,

学习和教育的质量也就越等而下之,流于形式。如何将中央和国家一级的一些高质量的宣传和课程的内容直接地原原本本地传到基层,如何采取种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使基层的领导、普通人民群众了解国家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的动机、目的、面临的困难与希望所在,乃是我们特别精心筹措实施之事。

只要我们从中央到基层有一大批不但信仰坚定、且能有说服力地宣讲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人,党的事业就了可靠的保证。

其次,我们应该分门别类,通过各种个案精心地研究当前我们社会所存在的各种文化思潮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善于引导,趋利避害。我们应该承认,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士的不同文化需要,同时积极鼓励其向主流思想靠拢。在有条件的行业、阶层、区域,大胆而又谨慎地进行一些实验,导引我们的文化建设向我们的最终纲领发展。例如足球,经过五年职业化的开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影响巨大而不致危及国体、政体的文化运动系统。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系统内形成了各职业俱乐部与足协的尖锐矛盾,数千万球迷群众与中国足球运动(如假球、“黑哨”之类)的矛盾。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如果将这些矛盾加以深刻分析,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根本的是理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归结到我们文化建设的具体运作,是否可以采取与国际接轨的方式,让中国足协完全由民选而非官方任命的方式产生;让各个俱乐部完全实行公司化,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这样的作法,既是在我们的一个文化部门局部推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尝试,也是在这个局部推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尝试,而它本身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表现形式,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某个局部的一种带示范性的尝试。一石而三鸟,何乐而不为?如果这种尝试不幸失败,其影响将不会越出体育部门和球迷,将不致给社会造成大的震荡;如果它成功,将对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中推进的民主政治改革遥相呼应,其巨大的政治、文化作用将不言而喻。

我们还可以做的事情尚有很多,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是得有人去做。因此最后我们想谈谈运作的组织问题。

我们认为,目前存在严重问题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建设的极不重视,一是组织的疲软涣散。

先谈谈第一个问题。

文化建设虽已被党中央提高到与经济、政治建设鼎足而三的地步,但由于它的难以有硬性指标衡量,看不见、摸不着,所以长期以来没有被列入很多人都极其重视的“政绩”考察范围。更有人抱有这样的心态:文化往往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弄好了,看不见,弄得不好,就是犯政治错误,因此宁肯离远一些,完全放弃对文化建设的关心。即使迫不得已要说几句话,也多是言不及义,隔靴搔痒,宁“左”勿右。这样一种状况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在文化建设中占有先导作用的社会科学研究已被漠视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放眼各民族历史,没有任何一个自然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或民族其社会科学研究是落后的,难道独有中国可成为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艺术家而唯自然科学称雄寰宇的跛腿巨人吗?

是时候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得到振兴了。而这种振兴必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

再谈谈第二问题。

如果排列一个与文化建设有关的机构,大约不难数出七八个部、局,而它们相互之间却互不统属,缺乏有机协调。我们认为,按照中央所提出的文化建设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来看,首先应该有一个协调性的机构来统揽文化建设的全局,中央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兼有指导、协调之责的常设性的机构。其次,从中央到地方,社科院系统与大专院校应相互协调,分工合作,各自承担起相应的调查研究、预设方案、指导方案实施等工作。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从学者们的书斋中走出来,与现实密切合作;而文化建设绝不能停留于大轰大嗡的个别“节”、“日”之类,而应该像环境保护计划那样小到街道上匾额一个字书写的正确与否,大到某些号称“工程”的实施的实施,都要有预案、有实施、有监督、有反馈、有评估、有结果。所有文化思潮、活动的评估、引导都要将其目前和长远的利弊通盘考虑后以决定取舍。

总之,高度的重视和坚强务实的领导、组织,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必将获得成功的保证。

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阶段。党中央已经把庄严的任务置于我们面前。我们每个从事理论、宣传、教育、文艺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所肩负的重任,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竭尽全力地奋斗。中华民族将不会自惭于世界,因为它将有以最现代的高科技和经济铸成的坚强体魄;它也绝不会愧对于祖先,因为它躯体的血管内,永远奔涌着黄河、长江。

注释

[1][2][13][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08页、367页、338页、367—368页。

[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0页。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663—664页、704—706页。

[5]公元前321年,意大利人在卡夫丁峡谷大败罗马军队,迫使俘虏屈辱地从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因而马克思以“卡夫丁峡谷”比喻灾难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5—436页、451页。

[8]据1998年4月17日、6月12日《南方周末》报载,陕西礼泉县副县长女儿自由恋爱私奔,该副县长竟伙同县公安部门个别人非法拘捕、毒打男方父亲至死即为显著案例。此类事甚多,难以枚举。

[9][10][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76页、698页、679页。

[12]最近的例证,请参1998年11月5日《中国青年报》刊《两支队伍包围焦点访谈》。又参1998年11月17日《中国教育报》刊《期待舆论援助》。

(李 诚: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8)